

# 董其昌诸子及董氏第宅

颜晓军

**内容提要** 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变革，在以往的研究中，董其昌四个儿子的姓名和生平都被忽视了。特别是次子董祖常的名字被混淆，幼子董祖京则被忽略。该文征引各种史料，对董其昌诸子生平及董氏家族第宅方位作详细考证，并进一步探讨诸项与董其昌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该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江南士族社会的变迁与人物命运的沉浮。

**关键词** 董氏族谱 董其昌诸子 董氏第宅

## 一 引言

以往有关董其昌的研究中，对其家庭的研究相对薄弱。1988年出版的《董其昌系年》提及董其昌的家世<sup>①</sup>；1989年出版的《董其昌年谱》载入了“董氏世系图表”<sup>②</sup>；1991年出版的《董其昌史料》里，对世系图表又有了新的订正<sup>③</sup>。1997年出版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作者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董氏家族的世系脉络、人物兴衰进行了记述<sup>④</sup>。作为早期的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在董其昌家庭研究方面或仅是简单地收集史料，或是语焉不详，即使稍加考证也大多寥寥数语，难免错误之处。主要的原因是学者们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董其昌作品及其书画理论方面，对其家庭等属于历史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则相对忽视。加之上海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八年刊光训堂《董氏族谱》未能得以公开和广泛使用，董其昌的家世和家庭情况便一直不为人详知。直到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吴耀明凭借《董氏族谱》这一重要文献，以《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述论》(以下简称“吴文”)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有关董其昌家庭生活及其子孙后代的详细情况才得以梳理<sup>⑤</sup>。

①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③ 王永顺主编：《董其昌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 “吴文”认为，“没有看到、也就均未引用《董氏族谱》”的著作中包括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然而吴仁安此著第十章“附录”第三节“撰著本书征引的家乘、年谱、宗谱、族谱等谱牒资料及其他相关方志、论著一览”就列举了华亭《董氏族谱》。见吴耀明：《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述论》，“绪论”第二部分“学术史回顾”，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

笔者从2006年开始研究董其昌及其艺术，曾多次查阅《董氏族谱》，注意到以往研究中关于董其昌家世和子孙的一些问题，逐步积累资料准备专门叙述。后“吴文”已先行撰写并相对完备，但尚有一些文献资料，“吴文”并未采用，或针对同一材料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或观点殊异。故撰此文，以补阙疑。本文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辩董其昌诸子及其生平活动，第二部分考证董氏家庭的第宅位置关系。

## 二 董氏诸子生平考证

在一些史料与董其昌本人的文字中，出现了一个名为“祖京”的儿子。但是在较早的文献研究中，如郑威《董其昌年谱·董氏世系图表》所列，董其昌仅三子，即董祖和(字孟履，图表写作“履”)、董祖常(字仲权，图表写作“权”)、董祖源(字季苑，图表写作“苑”)。明人《民抄董宦事实》即记载了这三个儿子。清代卞永誉《式古堂朱墨书画记》仅记载了祖和与祖常这两子，然此书并非专门研究董其昌家世，只是提及而已，记载不全的原因或是囿于见闻，或仅是择要记载。曹家驹《说梦》亦延续了“董文敏有三子”的说法，并未加以深究。另外被称为董其昌儿子的还有“祖权”，长期以来也未有详细考论，以至于学界误以为董其昌只有三个儿子，或者以为祖京是三个儿子中某一位的又名。

然而，依据松江光训堂《董氏族谱》卷二《世谱》所载，董其昌实际上有四个儿子。除了长子祖和为董其昌原配夫人龚氏所生，另外三个儿子都是庶出，生母都是董其昌的姬妾。《董氏族谱》记载云<sup>1</sup>：

祖和，字孟履，号起玄。上海廩生，荫入国学，选都察院照磨，升工部营缮司主事。配潘氏，葬四保五六图新阡，子庭、广、用威、赓。

祖权，字仲权，号得庵。华亭庠生，以荫选太常寺典簿，升南京应天府通判，升刑部江西司主事。生母陆氏，配潘氏，葬胡港上原新阡，子延年、康、虞。

祖源，字季苑。官生。生母刘氏，配徐氏，子黄中、建中。

祖京，字欲仙，号瀛山。官生。生母唐氏，配王氏，子之帷。

根据《董氏族谱》卷八沈荃为董祖和所作《行状》，祖和生于万历丙戌(1586)二月十六，歿于康熙壬寅(1662)四月初一，享寿七十七。则董其昌三十二岁方才生祖和，之前未见生子记载，故以祖和为长子。

董羽宸称赞董祖和的品行曰<sup>2</sup>：

孟履颖茂性成，学能抉入玄奥，则雄视艺林，从善如流，嗜义若渴，心可告天，行不愧影，孝友之德，诚中形外，何一出文敏公下？

沈荃也说：“长公之宅心仁厚类如此。晚年好长生之术，于东郊结庐数椽，采药服炁，神采怡悦。”<sup>3</sup>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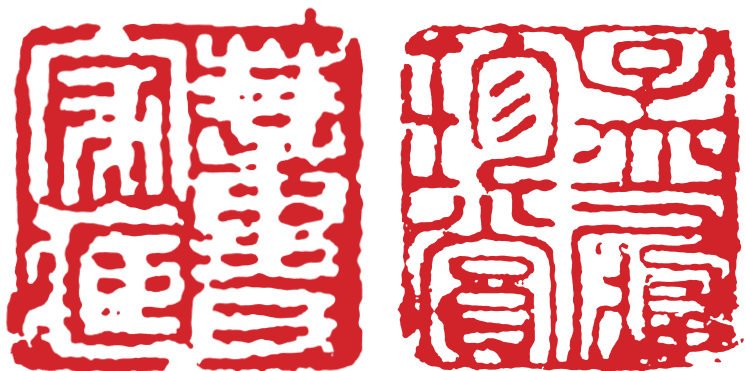
<sup>1</sup> 松江光训堂《董氏族谱》卷二《世谱》，第2册，页16—17，康熙五十八年刊，上海图书馆藏。

<sup>2</sup> 前揭《董氏族谱》卷六《世传》，第4册，页30。

<sup>3</sup> 前揭《董氏族谱》卷八《行状》，第5册，页47。

〔图一〕《画禅室小景图册》上铃盖的“董氏家藏”印  
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岩居图》上铃盖的“孟履珍赏”印  
无锡博物院藏



甚。而余写《金刚经》荐资父母冥福凡二本，其一壬辰春藏于云栖莲池大师禅院之库中，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其一即此册。相去四十年，目力腕力不甚远，岂般若种子微有赞助耶？以付祖和，永为世守耳。二月朔，思翁识。

这是董其昌人生中最后一次起用赴职，此年其夫人龚氏仍然在世，祖和乃龚氏所生长子，已经四十七岁。龚氏虔信佛教，董其昌让祖和送到清和之后便返家侍奉母亲，并将自己天启六年(1626)所书《金刚经》交付祖和收藏，以期世代宝守。同年八月，松江居士朱时恩欲刻《居士分灯录》，请七十二位居士捐资以助刻。书中记载的捐助人有五钱和三钱两等，董祖和之名在捐五钱之列<sup>〔2〕</sup>。

除了这本《金刚经》，董其昌托付给董祖和的作品还有天启二年(1622)壬戌所作《仿燕文贵笔意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故画02310)，其上铃盖有“孟履珍藏”朱文方印和“董氏家藏”白文方印，都是董祖和的印章。另在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作《画禅室小景图册》每页画作的右下角亦有“董氏家藏”白文方印〔图一〕，即董祖和的收藏印。无锡博物院藏董其昌《岩居图》上亦有“孟履珍赏”朱文方印〔图二〕。

董祖和仁厚向善的品行，很大程度上遗传自其母龚氏。陈继儒撰《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记龚氏云：“夫人端静纯恣，秉正义，曙大体……既贵，夫人衣浣饭蔬，无异寒窆诸生时。不海妒，不治游，不通门外瑱环之问。抚视诸娣媵如女，教诫诸子孙如察吏严师。若呵骂鸡犬，鞭笞童婢，绝响矣。”<sup>〔3〕</sup>可以进而分析，董祖和出生时，董其昌尚未显达，家境较为拮据，其母亲龚氏性格端静，持家节俭，无有奢欲，且奉佛虔诚，教育子女严格慈厚，所以祖和在董其昌诸子中性格最为端厚。而沈荃称祖和妻潘氏云：“簪纓世裔，闾德彰闻，上侍姑舅，克敦妇道，下训子嗣，无忝母仪，御众宽和，待下慈恤，裁断家务，动合几宜，古称四德，唯宜人有焉。”<sup>〔4〕</sup>母亲和妻子都是慈厚贤淑之人，故祖和待人接物也是仁厚随和。《秘殿珠林》卷七《明

知董祖和生平为人仁厚好义，且注重养生之术。

董祖和还崇信佛教，应是受到父母影响。董其昌于崇祯五年(1632)七十八岁时起故官，应宫詹大宗伯之召，又北行至北京任职。此年的二月朔日，他题跋自己所书《金刚经》云<sup>〔1〕</sup>：

丙寅年十月书此经，朔日起，望日竟。壬申二月应官詹宗伯之召，道出淮阳，长儿祖和从行，至清和，命之归侍母龚淑人，念淑人奉三宝虔

〔1〕 《秘殿珠林》卷二《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二册》，《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823册，页508，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明)朱时恩：《居士分灯录·居士分灯录劝缘引》，《禅宗全书》第14册，页13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3〕 (明)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六，页5，《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崇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4〕 前揭《董氏族谱》卷八《行状》，第5册，页47。

董其昌书心经一轴》款云：“万历己酉年四月八日，董其昌敬书。”此轴为宣德泥金黄表笺本，其左下角有“孙男用威珍藏”印。用威即董祖和之子，其家中仍有董其昌作品。

董其昌次子董祖常，其母为董其昌妾陆氏，妻潘氏，其子延、康、虞分别出自丁氏、□氏（《董氏族谱》原书缺姓）和任氏。关于祖常的长子董延，“吴文”发现《董氏族谱》先后曾出现了不同的姓名记载，又有“延年”一名。然而在崇祯三年本《容台集》中有董延署名编次，故可知“董延”应是其正名。

而文献中董祖常还出现了“董祖权”一名，如文秉《定陵注略》卷七《松江民变》有“仲子祖权依势横行，民不堪命”之说。《董氏族谱》卷二《世谱》也作“祖权”。然而“民抄董宦”事发后，《民抄董宦事实》、松江府生员的辩冤状中皆称其名为“祖常”。“民抄董宦”所称姓名是当时人所记，“辩冤状”也是事发时应用之文，应当不会出错。而文秉《定陵注略》乃后来记载，《董氏族谱》也是迟至康熙五十八年刊刻，所以将其名误为“祖权”。分析董其昌为前三个儿子取名的规律，三个人都是“祖”字辈，名为“祖和、祖常、祖源”；而取字则按“孟、仲、季”排列，分别是“孟履、仲权、季苑”。所以，“董祖权”之名是混淆了董祖常的名与字。

“吴文”认为族谱中以“祖权”代替其名“祖常”是因为董祖常的恶名劣迹，让修谱的族人亦不齿与之为伍，故为之改名。这个观点属于猜测。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董祖常没有正式的传记资料流传下来，而没有传记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董祖常个人品德的问题，而是其次子董康（其他文献多作“董刚”，“吴文”已有详细考证，此处不赘）受策划反清活动的谢尧文通海案牵连被处死。《董氏族谱》卷二《世谱》记载董祖常一支时，将其长子董延记作“延年”，而次子董康的儿子董斌及以下的后代和他们字号、母、妻的信息均被涂墨遮盖；三子董虞的子嗣后代信息，亦被涂墨遮盖，仅有字、生母、妻室的简略记载。因此董祖常一支在清初是尤其受忌讳的，所以没有详细资料流传，以至于修纂族谱时，后世将祖常之名都弄错了。如果是董氏族人厌恶董祖常而耻于为伍，根本不会让他的姓名出现于族谱中，而非这样半遮半掩的。

董祖源生平亦不详，《董氏族谱》中董羽宸为其所作传是了解其生平的重要资料<sup>13</sup>：

……初入庠，今荫入官生。季苑生质端颖，束发有巨人志，经史刮目，得心应手，理凝气锐，沛若江河之决，而试不快意，乃入句曲山，潜心发愤，三年蔚然文学名家。而南北棘闱奇于数，始入都承荫以归。键户读书，修若世外，清修不啻寒素。方以持己，圆以应物，虚怀受善，悝志敦伦。而胸中无半点烟尘，眼底无一毫障滞，亦得之深由静观中多也。至于孝于亲，友于兄弟，百行淳备，出乎至性，尤足彰文敏公世德之光，子若孙克昌厥后，可立而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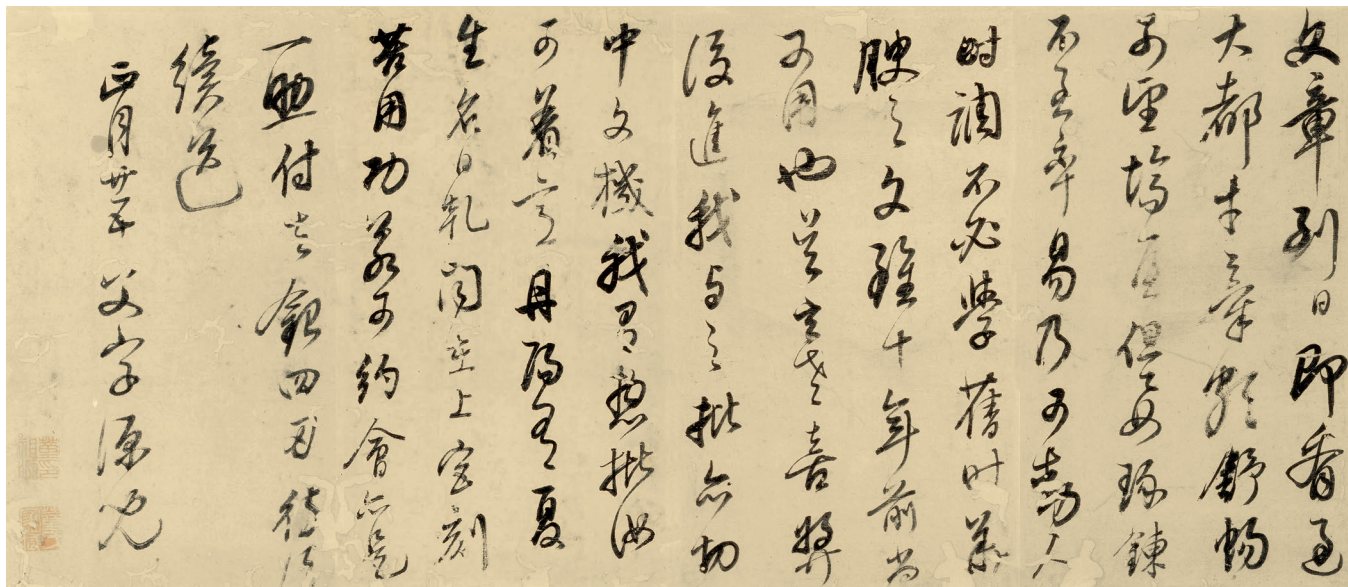
这段传记的主要部分是夸赞董祖源聪颖好学、擅长文学。与董祖和的仁厚、董祖常的骄横不同，董祖源的确遗传了董其昌的文艺天赋。这一点董其昌非常清楚，他也很看重祖源的才能，平日花了很多精力来培养祖源。董其昌望子成龙的殷切热望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封信札中可以看出<sup>14</sup> [图三：1]：

文章到日即看过，大都才气颇舒畅，可望场屋。但要琢磨，不至率易，乃可动人。时调不必学，旧时华腴之文，虽十年前尚可用也。吴玄老喜奖后进，我与之批，亦切中文机。我有总批，汝

13 前揭《董氏族谱》卷六《世传》，第4册，页31。

14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5册，页166—169，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图三：1〕董其昌致董祖源札  
上海图书馆藏



〔图三：2〕“董祖源印”、“董氏家藏”印



可着意。丹阳有夏生名日乾，闻在上官，刻苦用功，若可约会，亦是一助。付去银四两，待（后）续送，正月廿五，父字源儿。

此信中董其昌为祖源点拨文章，并请前辈批阅祖源文章以助儿子名声；还介绍文友给祖源切磋，鼓励他前去拜会。所以，董祖源在文章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陈继儒称赞他<sup>〔1〕</sup>：

独思老旧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长新，江汉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而刻之，意欲持以砥世范俗，何忍复私其枕中之秘哉。季苑好静坐句曲，不屑以世务经怀。覲亲辇下，因试北雍，不敢与熟贵人相交关，策蹇南还，丹铅经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淡家风，岂独得其文印而已乎。

由此可知，董其昌数子当中，最有希望获得功名的是董祖源。董其昌本人擅长制义，未中进士前曾经在平湖私塾中教书，后来又被陆树声、王锡爵聘请教授陆彦章、袁可立、王时敏等人。董其昌对董祖源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还将制义旧稿留给祖源。但是董祖源在科考中并不顺利，后来还是承袭了恩荫。祖源的性格比较好静，能够在句曲山中读书，飘然世外。陈继儒就将他与董其昌相比，特别提到“丹铅经史不去手”。在书画与读书方面，祖源是与董其昌最为相像的。董其昌此札后有“董祖源印”朱文方印和“董氏家藏”白文方印，应该都是董祖源所钤〔图三：2〕。祖和祖源都有“董氏家藏”印，但是印文刻法有别，

〔1〕（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重刻董宗伯制义序》，页30，《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

不是同一方印。

由于董祖源爱好书画，董其昌的一些书画精品都是经其收藏的，如上海博物馆藏《秋兴八景图》册、故宫博物院藏《仿古山水》册等作品上皆钤有“男祖源珍藏”朱文方印〔图四〕。此印见于著录的还有《董华亭书画录·董文敏仿郭恕先立轴》，作于天启五年(1625)乙丑。《湘管斋寓赏编》卷四《董玄宰小楷袖珍卷》记载，此卷上亦钤有“男祖源珍藏”印。

〔图四〕《秋兴八景图册》上钤盖的“男祖源珍藏”印 上海博物馆藏



这足见得董祖源能够秉承父志，而他本人也擅长绘画，可惜流传甚少。赵珩《文人画琐谈》曾论及自家收藏的董祖源作品，是较罕见的详细讨论董祖源绘画的资料，故全引如下<sup>①</sup>：

董其昌之季子祖源也擅长绘画，而几乎没有作品传世。先祖旧藏董祖源册页，纸本旧裱，且残破较甚，似经丧乱。册后有许巨川诗跋。许巨川与董祖源是表兄弟，跋中明确道出此画是华亭民变中之遗珠。为此，我曾查阅明末《民抄董宦事实》一文，此对当日华亭民变经过记述颇详。董其昌与子祖和、祖常、祖源同居乡里，除祖和一宅因“平日稍知敛戢，民怨未深”而“巍然独存”外，董其昌与祖常、祖源三宅“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之中矣”。祖源的房子在三宅之中，是最后被焚的，其屋舍华丽，收藏之丰，又远逾乃父。“其妻为徐相国玄孙女，苏州申相国之甥女，奁资极盛，造堂房二百余间，楼台堂榭，高可入云。粉垩丹青，丽若宫阙，此真轮奂之美也。乃落成未半载，一炬成灰，渐灭殆尽。”

这本八开山水册页是祖源作于民变之前，许巨川的诗跋既表达了与祖源的中表之情，同时对祖源的绘画才华也极为推崇，认为祖源的才气远在苏庭硕、米元章之上。祖源字季苑，题款或书祖源，或书季苑，从题款的位置上看，很有可能是在画成若干年后补题的。笔墨多为习作或不经意的作品，据许巨川跋语可知祖源卒于丁亥(一六四七)，大约晚于董其昌十一年。

祖源作品未能较多传世的原因，除因华亭民变，一部分被毁之外，主要是因为他不以绘画作谋生手段，阅古临摹仅为消遣于笔墨之间。当然，与祖源未仕，且在松江府一带名声不好也有一定关系。仅从旧藏董祖源八开册页看，他对笔墨的运用和气韵的抒发确实是直追元人，其中二幅是仿董北苑的作品，皴、擦、点、染互施，枯中有润，于不着力之中尽显古人笔意，确是不为物象所束缚，趣味高致，堪称逸品。

如果许巨川跋语中董祖源卒于丁亥是确切的信息，那么顺治四年(1647)祖源便辞世了，算是比较短寿的。他的绘画风格遵循董其昌的教导，以南宗画为学习典范，可以“直追元人”，特别是模仿董源之作尽显古人笔意，画格在“逸品”范畴。

但是，董羽宸给董祖源所作传记显然充满了溢美之词，因为就祖源文艺方面的修养而言是比较符合他的

① 赵珩：《文人画琐谈》，《读书》2006年第8期。

描述的，而其为人处世则并非“百行淳备，出乎至性”。

董祖源的大哥董祖和出生三年之后的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中进士，跻身于上层士绅社会。董祖源的二哥董祖常的生卒年不详，但他们二人应当年纪相差不大。董祖常出生时董其昌的家境应当明显好转且殷实了，加之董其昌忙于经营仕途，相比祖和，董其昌对祖常恐略失于管教。所以祖常养成了骄横的习气，以至于后来酿成大祸。董祖源出生时，董氏家境已经步入富裕之列，在松江的士绅阶层中，地位也大有抬升。所以，董其昌为祖源攀得了首辅徐阶、申时行这样的姻亲。

根据《民抄董宦事实》所说，“其妻又为徐相国玄孙女，苏州申相国甥女”，董祖源与当时最为显赫的两大家族结为亲戚。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董祖源的岳父应是徐肇惠，字荇夫。徐肇惠的祖父为徐阶，他是徐阶第三子徐瑛的长子。肇惠本人也蒙祖父官荫仕至尚宝丞，未赴而卒<sup>1</sup>。万历四十八年(1620)董其昌绘《风亭秋影图》(现为私人收藏)，即是赠送徐肇惠之作。画上题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仿倪雲林，为荇夫老家家。庚申中秋，玄宰。”《尺牋辞典》曰：“子之岳父母曰亲家，女之翁姑亦曰亲家。通函即称‘亲家’。亦有称男亲家为‘亲翁’，称女亲家为‘姻嫂’者。”<sup>2</sup>因此，徐肇惠与董其昌为亲家，董祖源的妻子应该是徐阶的曾孙女，而非玄孙女。

《民抄董宦事实》云<sup>3</sup>：

祖源雄于父贵，而其妻又为徐相国玄孙女，苏州申相国甥女，奩资极盛。初辟居时，止数十椽，以后广而大之，乃尽拆赁房居民之居而改造焉。亲见其未迁居之小户，被董仆揭其屋瓦，露居雨立，逼逐搬徙而无奔者。

董祖源能够在马喆寺购置住宅，勒令邻居拆迁，可见其雄厚财力与八面威风。在土地与房屋的买卖交换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利益冲突，或因未满足拆迁条件而产生“钉子户”。但以一己之私欲凌驾于他人毁家破产的代价之上，也可见董祖源德行修为上的缺陷。“福缘善庆，祸因恶积”，董祖源的豪宅落成刚刚半年左右就被暴民付之一炬。他营建此宅，应是在结婚之后，若以二十岁结婚来算，推测他大致出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前。在董其昌这三个儿子中，唯有长子祖和为人品谦和，故其住宅虽夹在董氏诸宅中间，百姓却有意保护不予烧毁。

董祖源有二子黄中、建中，次子董建中生母并非出身高贵的徐氏，而是祖源之妾许氏。建中遗传了董其昌的艺术基因，也擅长书画，史称其画花鸟得黄筌法。《董氏族谱》记载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康熙帝南巡时与董建中的交往，董建中进呈董其昌真迹一轴、花卉一册、万寿蟠桃一幅，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说起自幼跟随松江人沈荃学习董其昌字体，并了解了董建中家庭情况，给予赏赐与照顾。董建中作品存世尚多，除博物馆藏品外，笔者亲鉴杭州灵隐寺藏有董建中花鸟画一轴，大约是清初时风，以没骨画法为主〔图五：1、2〕。

114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2016年第6期·总第188期

〈1〉 《松江府志》卷五五，页1237，嘉庆二十二年刊，《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2〉 吴东园等：《尺牋辞典》子集“称谓类”，页13，国华书局，1921年。

〈3〉 《民抄董宦事实》页286，《明代野史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民抄董宦事实》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事件，尽述董其昌、董祖和、董祖常、董祖源宅第，唯丝毫未曾提及董其昌第四子董祖京之事，合理的解释应是当时祖京尚未出生。陈继儒在董其昌去世后作《祭董宗伯文》，其中有云<sup>1</sup>：

兄亦何恋，兄亦何牵？祖京年稚未婚，而妇翁如王太常者，夙闻其家范之端严，虽子衿未青，而名师教之，名兄辅之，岂难一博士弟子员？

由此可以判断董祖京为董其昌少子。董其昌卒时，董祖京尚未成年，没有结婚，但是应当长成了十岁出头的少年，而且已经有了定亲，其妇翁为王太常。所以陈继儒认为这个少年有其岳父家族的扶持，还有其兄长的辅导，虽然年幼尚未获得功名，但一定会有好的前途。若假设董其昌卒时董祖京为十八岁以内而十二岁以上，则可以推测董祖京差不多是董其昌六十五岁后到七十岁前晚年所得之子。由于陈继儒在董其昌卒后撰《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可知董其昌元配夫人龚氏应稍先于他去世，且年龄衰老。加之董其昌晚年姬妾众多，故董祖京应是某一位侍妾所生。而据《董氏族谱》记载，祖京生母唐氏，配王氏，子之帷（《世传》记载名“奕璜”，原名“之帷”）。

其实，陈继儒所说董祖京的岳父王太常即王时敏，其次女嫁给了祖京，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婚。从时间来看正好是董其昌去世三年后，符合古人守制三年的规矩。《王时敏年谱》云：是年“次女适华亭董祖京”<sup>2</sup>。王时敏第五子王抃也称此年“二姊于归董氏，文敏公之第四君也”<sup>3</sup>。皆可证明董、王两家的姻亲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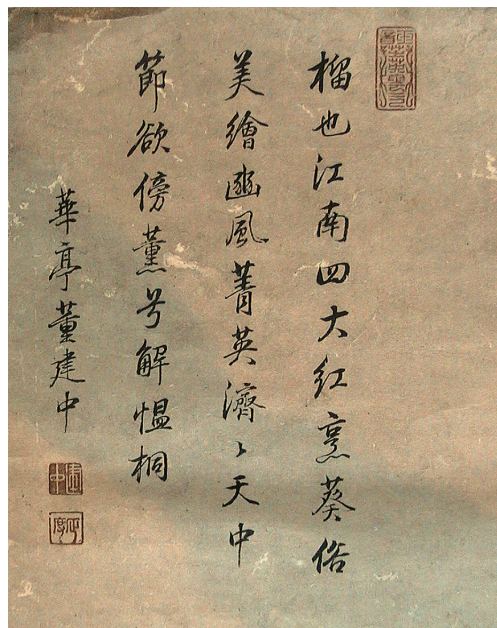
但是后来董家逐渐衰落，日子并不好过。《西庐家书》记云<sup>4</sup>：

此月中旬，松江徐家姊同福官小女到家，住四日而去。其贫已极，衣皆旧敝，头上皆白骨铜簪。据云口食不周，无以度日，细察其情状，比前实可哀怜，非有矫饰。

〔图五:1〕董建中 《花鸟轴》(局部)  
杭州灵隐寺藏



〔图五:2〕董建中 《花鸟轴》题跋  
杭州灵隐寺藏



〔1〕 前揭《白石樵真稿》，页158。

〔2〕 (清)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卷二，《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页38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3〕 (清)王抃：《王巢松年谱》，《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四，页15，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9年。

〔4〕 (清)王时敏：《西庐家书》“丙午一”，《丛书集成续编》第122册，页1032，上海书店，1994年。

去未几日，忽董家二姊差其妾喜姐持书昏夜扣门，必欲面见。书云：穷困已极，南翔房租力不能还，房主有见拒之意，欲挈家搬到我家。其作想甚奇。当夜，汝母大叱挥之出宅，我差人送夜饭至舟中，见欲仙与子俱在船中，我亦佯为不知，次早略送舟金米担而去。我思徐、董皆天大人家，一旦狼狈至此，虽其望我者深，殊欠体谅。然情关骨肉，岂能恣然。父母俱因贫窘，既不能少有周助，而汝母词色加厉，绝之已甚，殊为不情。

“松江徐家姊”是王时敏的三姊，即王衡的季女，妻徐本高。“福官小女”应是王时敏三女，于崇祯十三年(1640)嫁给徐本高之子徐佐(羽明)<sup>1</sup>。徐本高的祖父是徐元春，徐元春则是徐阶的长孙。因此王、徐、董三个家族相互之间有着错综的联姻关系。虽然王氏与徐氏都是宰相故家，而董氏亦是豪族，但是经过明清易代的历史现实，都走向了没落。王氏后人犹有显达，徐、董二氏这样的“天大人家”则淹没无闻，实为可叹。南翔有嘉定李氏家族，王衡的长女与四女皆配李氏。王衡、王时敏父子与南翔李先芳交好，王衡四女即是李先芳次子李宗之的妻子。董祖京家竟然流落到租住南翔，并无力支付房租的地步，转而向王时敏求助，希望挈家搬到王家过渡，结果遭到王时敏妻子的呵斥和拒绝。王时敏念在骨肉之情，还是差人送夜饭与金米至舟中，竟然董祖京夫妇都躲在舟中，王时敏也“佯为不知”。从王时敏的叙述来看，董家在明清易代中的衰颓景象跃然目前。虽然董祖源娶了徐肇惠的女儿而奢极一时，但估计后来的家庭生活与其幼弟董祖京一样逐渐破落，特别是顺治四年(1647)祖源去世之后，其家之衰败比之祖京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时敏不仅是董其昌的高足，而且成了董氏的儿女亲家。董其昌有多幅作品赠送王时敏。如《虚斋名画录》卷十三有《明董文敏为王逊之写小景山水册》，作于天启五年(1625)，其款跋云：“乙丑九月，自宝华山庄还，舟中写小景八幅，似逊之老亲家请正。玄宰。”<sup>2</sup>作品今藏上海博物馆，这说明董其昌七十一岁时便与王时敏定下儿女亲，则董祖京还甫及髫髻。《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有《又董文敏为王奉常画山水立轴》，作于崇祯二年(1629)，也是送给王时敏的作品，其款跋云：“逊之尚宝以此纸属画……己巳又四月廿一日，青龙江舟次，其昌似逊之老亲家正。”<sup>3</sup>

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书手札》册共有五札，从行文内容和“老亲翁”的受信者称呼来看，都是写给王时敏的。其中有三札提到董祖京，其一云：“小儿久失学，今年得师，或不至负老亲翁至爱耳。余有嗣布。”其二云：“每向眉公云，屡拜厚赐，而敝里一无佳产可以奉报百一。兹又辱种种分甘，且京儿过损金玉之惠，举家惭感，先此布谢。”其三云：“小儿京自七月面试，三六九皆作二篇，顷县试未冠题，令拟一首，虽单薄无华，未至荒涩，呈老亲家览之，以慰厚望于万一耳。”<sup>4</sup>另有第四札书于二月十九日，董氏提到自己“以先往海邑为亡儿分拨家事，滞留数日”，因《董氏族谱》无此“亡儿”姓名，有可能推测为另一位年幼之子夭亡，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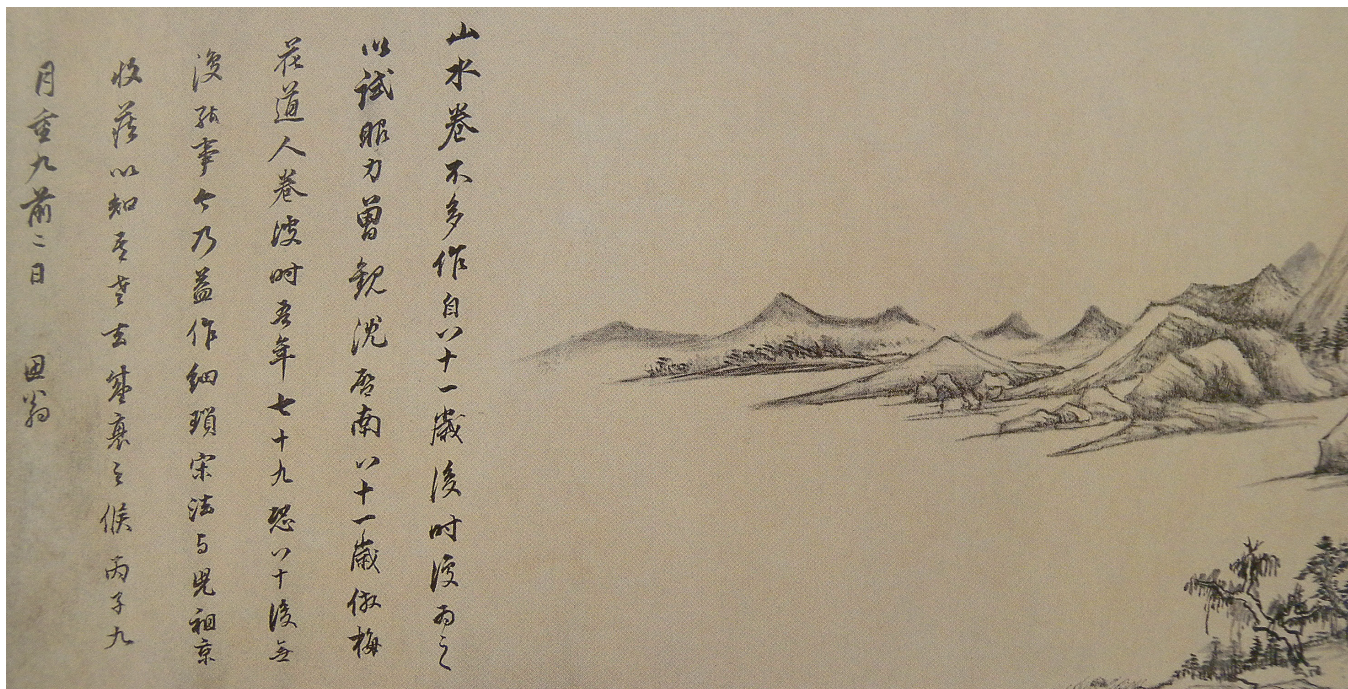
1 前揭《奉常公年谱》卷二：“(崇祯)十三年庚辰四十九岁。正月，三女适华亭徐佐。”页382。

2 (清)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1091册，页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1068册，页2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集》页228-231，澳门艺术博物馆，2005年。

〔图六〕董其昌《细琐宋法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不见于记载。但是，若此“亡儿”为夭折小孩儿，应尚未成家，更不须董其昌远赴上海县为其分拨家事。目前无更多资料证明董其昌晚年有儿子夭折，且董氏见诸记载的四子中，唯次子祖常的生卒年不详，另三子均卒于清代，所以此“亡儿”更可能是董祖常，他卒于董其昌之前，其妻为上海潘氏家族成员。

《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集》对该札卷撰写的作品说明根据第一札“读至尊舅长公雄笔灼然，文肃正传，岂迹来习气自豪者所敢望。丙岁首抡可必矣”，认为“文肃”当为王锡爵，“丙岁”当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可知董其昌此札书于五十岁后，六十二岁前”<sup>〔1〕</sup>。然而该札卷数札书风一致，时间亦相差不多。其中三处提及祖京，且云祖京就学和县试等事。以董其昌六十五岁后到七十岁前生祖京来算，董其昌书此札卷时年纪至少在七十五至八十岁左右。而符合这一时间的“丙岁”只有崇祯九年(1636)丙子，书札的“嘉平廿日”应该是崇祯八年(1635)的十二月廿日。丙子岁是会试，而非殿试，殿试在崇祯十年(1637)丁丑。结合董其昌的其他作品来看，该札卷符合其晚年风格，应是很晚的作品。这样才能与他几个儿子的情况相符，由此推算董祖常的卒年大约是在崇祯九年(1636)的年初。

上海博物馆藏《细琐宋法图》卷〔图六〕，卷尾有董其昌题跋云<sup>〔2〕</sup>：

山水卷不多作，自八十一岁后，时复为之，以试眼力。曾观沈启南八十一岁仿梅花道人卷，彼时吾年七十九，恐八十后无复能事。今乃益作细琐宋法，与儿祖京收藏，以知吾老去盛衰之候。丙

〔1〕 前揭《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集》之《作品说明手册》，页52。

〔2〕 此作现存上海博物馆，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3册，页36，文物出版社，1997年。

子九月重九前二日，思翁。

根据题跋的文义，董其昌七十九岁曾观赏沈周八十一岁仿吴镇的山水卷，担心自己八十岁以后没有精力画画了。但是自八十一岁后，他又时常画山水卷，用来表现自己眼力未衰。董其昌对宋人的学习主要是在其年轻时，后来则逐渐由元四家的文人画上溯“南宗画”脉络。这卷《细琐宋法山水》卷却是规模宋人严谨繁密之意，其在董其昌集大成的晚年是很少见的。此图虽然在笔墨上仍然追随元人，但是构图繁复严谨，皴笔茂密苍郁，丝毫不见衰老的迹象。此卷落款是“丙子九月重九前二日”，即崇祯九年(1636)的九月初七日，董其昌犹神明灿然。按照陈继儒撰《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所记“仲冬九日，忽痰作，不三日而卒”来看，董其昌创作此卷距离他的卒日仅仅两个月，应当算得他最晚年的“巨制”了。董氏本人对此卷非常满意，所以交付给最年幼的儿子祖京保管，尽显他对这位幼子的疼爱之情。《董氏族谱》的九世传中，董其昌的侄辈董羽宸为董祖和、董祖源二人作传，却没有董祖常和董祖京的传记。个中原由，应是祖常为人令人不齿且有忌讳，而祖京又太年幼。

### 三 董氏第宅

明末清初王沅《云间第宅志》乃追忆明末松江富家旧宅，据其记载可知董其昌的宅子在松江府城东南隅。此处从前都是水田，董氏家族后来居上，逐渐在这块地方发展起来。甚至之后因水田逐步消失而龙渊水竭，淤塞的乌龙潭也被董庭买下作为园林，极尽亭台花木之盛<sup>①</sup>。松江府城以府治为标志，可以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城南面的风水是很好的，出了“四铁御史”冯恩、内阁首辅徐阶、礼部尚书董其昌等等大人物。而府治后面一带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那里虽然都是缙绅的第宅，没有一椽民房，但是“二百年来不发一科第”，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才出了一个朱景和中了科甲<sup>②</sup>。

松江城被水流东西横贯，然后分别向南北方向环绕，同时也形成更多更小级别的环流。于是，从俯视的角度，整个城被网状的河流分割成许多大小不一的区域。虽然明末战乱破坏了府城内的建筑分布，但是河流水网不会改变，依据河流的方向与流域便可找到具体的位置。

《云间第宅志》中一条记载：“南门内有河，自南亘北，有石桥三，曰新桥，曰迎仙，曰城隍庙，界至庄老桥入于河，东行支河一，自长春道院而东者已浅塞，一自陆家桥东过乌龙潭董文敏所。”<sup>③</sup>从清代嘉庆年间修《松江府志》的府城图(图七)可以看到，松江城的南门叫集仙门，那里的水流进城后，在南北走向的同时也向东分出三条支流，其中第一支自长春道院向东，但明末即已淤塞；第二条支流自陆家桥向东流过乌龙潭(又称龙渊)，此处就是董其昌的宅子。第三支自望仙桥向东流过千户所又分流向北过净土桥和米市桥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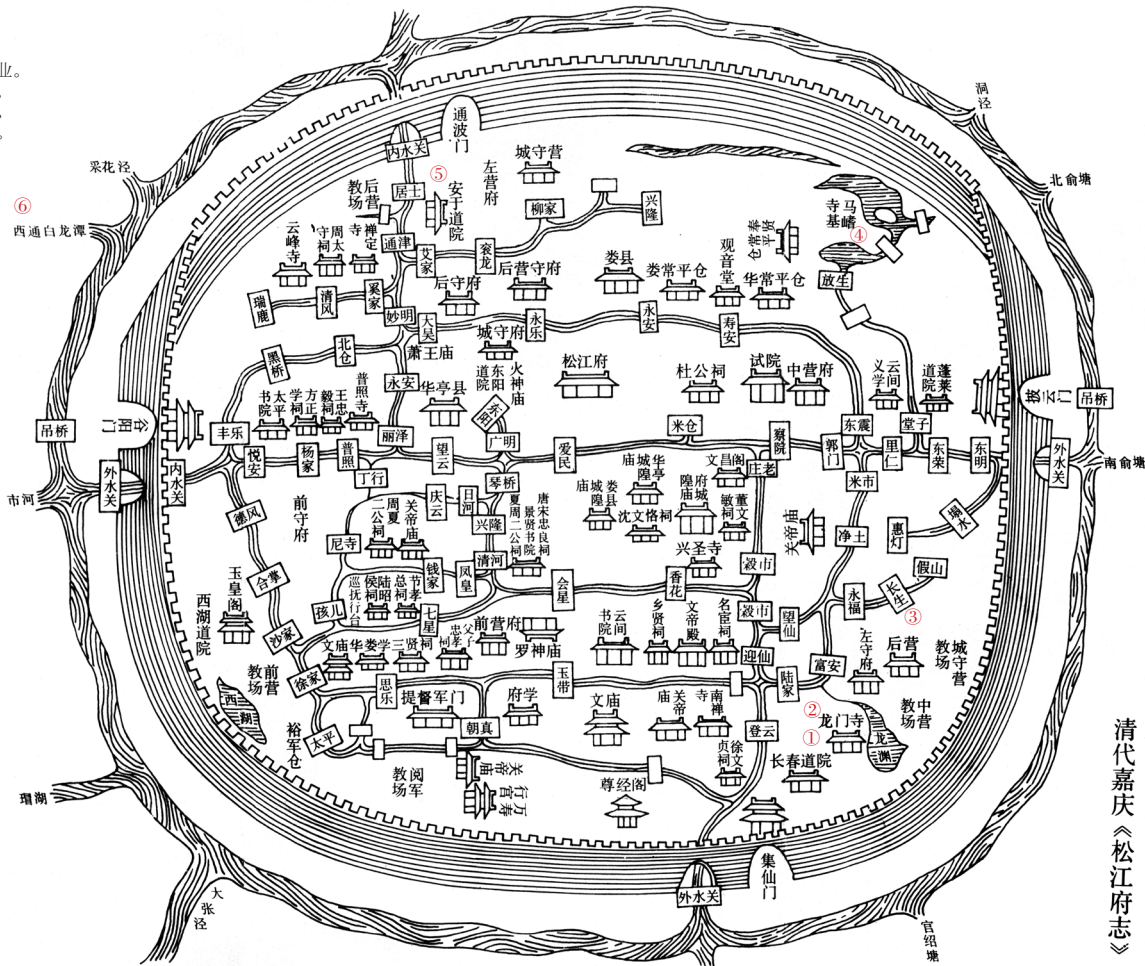
① (明)王沅：《云间第宅志》页3，《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 (明)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府后第宅》，页170，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7年。

③ 前揭《云间第宅志》，页2。

〔图七〕松江府城图中董其昌宅位置关系示意图

- ① 董其昌宅。
- ② 董祖和宅。
- ③ 董祖京宅。
- ④ 董祖源宅。
- ⑤ 董氏北门别业。
- ⑥ 董氏西门外，白龙潭别业，有“抱珠楼”。



松江府城图 华亭县娄县附郭

清代嘉庆《松江府志》

治前河；但东行的分流过长生桥才折向北，流经织造局坦水桥，循着东城隅入于治前河(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松江府志》上，此分流在“假山”、“惠灯”二桥间断开，大概至清中期河道淤塞，也被人为切断了)。龙渊在府城东南隅，董其昌宅子就在龙渊的西面。

《云间第宅志》又云<sup>13</sup>：

盛太学庆远宅，本陆孝廉万言宅。南面乌龙潭，与龙门里相对，今潭堙塞，董文敏孙庭筑为园。积庆寺东，从祖孝廉台榭宅，董文敏公其昌宅，长子荫君祖和宅在后。

由此可知，明末时期龙渊湖水逐渐堰塞干涸，董其昌嫡长孙董庭在此建筑园林。董庭是董祖和长子，董其昌崇祯三年本《容台集》就是他们父子编纂的。

董氏宅与潭之间，以前是冯恩之孙冯大受的竹素园，后来转卖出去，一分为三。南边是许誉卿的园林，

〈1〉 前揭《云间第宅志》，页3。

建有爱日堂；西面是杨汝成的园林；东面是杜元培的园林；居中是龙门寺，向北是杜元培的宅子。董其昌宅北是他的长子董祖和的宅子，再向北是杨继礼与其子杨汝成的宅子。杨家宅子的东面就是董其昌的学生叶有声的宅子。董其昌宅西与坐化庵相邻，有“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而且“平日美居室，凡珍奇货玩，金玉珠宝，与夫丽人尤物，充牣室中”<sup>1</sup>。

在这座豪华的大宅里，有不少雅致的斋堂。为鉴赏和创作书画，董其昌建置了“玄赏斋”和“戏鸿堂”。而他平日参禅悟道，以禅论书画，所以又有“画禅室”和“墨禅室”。不过“画禅室”和“墨禅室”这几个斋号并不一定都与固定的建筑联系在一起，他在画上会题“苑西墨禅室”，说明他在出仕之地也有此斋<sup>2</sup>。董其昌一生苦心孤诣地收藏董源的画作，来印证他的“南宗”画构想，并由他所收最得意的四幅董源画，设“四源堂”。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在西湖得到一个宝鼎，他很珍视此物，便以此名其藏书之室为“宝鼎斋”<sup>3</sup>。此外，他还为友谊深厚的陈继儒特意建筑了“来仲楼”。陈继儒在《来仲楼法书》后题跋云：“王元美先生有‘来玉楼’，为汪伯玉题也。董玄宰先生有‘来仲楼’，为余题也。两人登此楼，除法书名画别无间杂事。彦京与竹林之游累积成帖，百尺楼下客勿出示之。陈继儒题。”<sup>4</sup>

从董其昌家中面向东边就可以看到龙门寺水木映带、梵钟整肃的清旷之景。龙渊之水遇旱不竭，元代的杨维桢曾就寺游宿，手植的杉树仍然存在，只是大半后来都成了冯氏的竹素园。

《云间第宅志》又云：“西长生桥运司前聂吏部慎行宅，王副宪会宅有百客堂，高太史承祚子太学秉棻宅、秉藁宅，董文敏少子荫君祖京宅。”<sup>5</sup>上述流过乌龙潭的第二条支流继续向北，便与第三条支流向东的分流会合，流向长生桥，此处便是董祖京的宅子，在董其昌宅东北方向。

《云间第宅志》又记：“城西北隅马嶠寺，董荫君祖源宅，有龙孙馆，文敏书。”<sup>6</sup>王沅说马嶠寺在城西北，但是参照嘉庆二十二年府城图与现代地图可知应该在城东北隅，而非西北。马嶠寺又称北禅寺，原来是非常荒僻的地方，相传日偏薄暮即为鬼魅之乡。古寺年久逐渐颓圮，仅剩寺门两株古树屹立，四周民居侵蚀去大半土地。后来经过僧人雪庵、悟空的相继修葺，从前的僧寮佛宇都焕然改观，可以称作云间净土。寺庙之左是陈懿德的旧第，后归钱氏。何三畏购置后加以更新，扩大为园林，就是著名的“芝园”，大约有数十亩之大。园内有“观濠堂”、“歌风馆”，以及亭台竹木之盛，陈继儒曾为之作记。

〈1〉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285。

〈2〉 见万历二十七年(1599)作《溪山秋霁图卷》，见《选学斋书画寓目记续编》卷上，《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页94，现藏南京博物院。

〈3〉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条载董其昌《宝鼎斋帖》题云：“……甲辰秋，余得此于西湖，因以名藏书之室。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征余书者，以此塞请，足以简应酬之烦，一似永师作铁门限也。因书宝鼎名斋之意以系之。”《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页338—339，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 容庚：《丛帖目》第3册，页1247，中华书局，2012年。

〈5〉 前揭《云间第宅志》，页3—4。

〈6〉 前揭《云间第宅志》，页6。

《民抄董宦事实》对董祖源宅有详细记述<sup>1</sup>：

造堂房约有二百余间，楼台堂榭，高可入云，粉垩丹青，丽若宫阙，此真仑奂之美也。乃落成未半载，一炬成灰，死灭殆尽，仅故宫遗址，令人叹息，与荒烟断石之间而已。令祖源复过此，安胜禾黍之痛哉。

从地理位置而言，董祖源宅距离董其昌宅最远，属于松江府城中后来开发的地方，不是城南的传统吉地。刚开始董祖源宅子只有数十椽，但他为了一己之私，依仗其父董其昌，还有妻族徐阶、申时行家族，在扩建之时对邻居小户人家进行强拆。虽然他的宅子在董氏第宅中是最为豪华的，但是最终在矛盾爆发中遭受火毁，损失最为惨重<sup>2</sup>。

由以上王沄的四条记载可知董其昌宅、长子祖和宅、少子祖京宅，以及三子祖源宅，唯未提及次子祖常宅。但是根据史料可以分析，董祖常宅应该在董其昌宅附近。

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于董氏在松江当地积怨已久，爆发“民抄董宦”事件。据《民抄董宦事实》记载：“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泉孽董祖常’等揭纸。”又云：“只烧董宦一家住宅。且拆且火，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仅付之一焰中矣。”又云：“时祖和一宅介其间，巍然独存，盖以平日稍知敛戢，民怨未深故也。”<sup>3</sup>

案发后，由于事态继续严重化，松江合郡士大夫与孝廉齐发《合郡士大夫公书》与《合郡孝廉公揭》，来表达对应天学政、钦差督学御史王以宁督令苏松兵粮道处理结果的不满。以至于苏州、常州、镇江三府联合参与会审，《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有句云：“董祖常屋被焚抢，姑免深求。”<sup>4</sup>

《松江府辩冤生员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征沈国光张扬誉冯大辰陆石麟姚麟祚丁宣马或李澹陆兆芳》云：“吾松豪宦董其昌……扩长生桥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迁。”<sup>5</sup>又有一段专列董祖常恶行云：“兼以恶孽董祖常，一丁不识，滥窃儒巾；万恶难书，谋充德行；依仗父势，玩藐官常……”<sup>6</sup>又云：“先毁陈明之居，外火方起，内火应之，而祖常、祖源之宅俱为烬矣。祖和宅介其间，以敛怨未深，纤毫不动。”<sup>7</sup>又云：“而剥褪捣阴之祖常、陈明，从来未尝到官也。”<sup>8</sup>《权斋老人笔记载定陵纪略董氏焚劫始末》：“仲子祖权，倚势横行，民

---

〈1〉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286。

〈2〉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286。

〈3〉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284—286。

〈4〉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13。

〈5〉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14。

〈6〉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15。

〈7〉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17。

〈8〉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19。

不堪命。”<sup>1</sup>

以上文献显示董祖常平日为恶多端，终于引起“民抄”事件，为主要肇事者。虽然王沄所记未提及祖常宅，他的宅子应当与董其昌宅连为一处，所以宅子一起被焚。而三子祖源之妻乃徐阶曾孙女，平日亦骄横豪奢，故宅子亦被焚毁。唯有长子祖和为人谦让收敛，虽然宅子立于其间却巍然幸存。“民抄董宦”发生时，少子董祖京尚未出生，在此事件中没有涉及，然而董其昌已经扩展长生桥的宅地，后来便是祖京住所。

从龙渊的董其昌宅开始，最近是董祖常宅，向北是董祖和宅，再向东北的长生桥(后来的董祖京宅)，董氏住宅逐渐扩张，基本将城东南隅的董宅连成一片，并延伸到城东北马嶸寺的董祖源宅。在董氏住宅扩张的过程中，征地、强拆、毁契等事情时有发生，并且借助陈明等打手无赖的威风得以完成，所以百姓不仅深恨董氏，而且痛憎陈明等奴才走狗，故将他们的第宅焚毁。

在北门附近，董其昌还有另外一所别宅，也是他与朋友吟咏清赏之所。崇祯元年(1628)的清明日，董其昌曾约陈继儒在这里相会。他们欣赏、讨论书画，陈继儒为董氏所临写的王帖作题跋。董其昌称自己，“今日始悟法书，觉从前皆未得正龙正脉”。陈氏观赏了《曹娥》、《洛神补》二帖，“始信非诳语，此帖所在，非吉祥云覆之，当有天雨花其上”<sup>2</sup>。

松江城西门之外有一处名胜白龙潭，其南通小清河，北通二里泾，东出与护城河相汇合，北为采花泾。潭广约十余顷，相传有龙蛰伏其下，故名白龙潭。潭水很深而且清澈，可以用来沏茶或酿酒。如果天旱时祈祷，还可以求雨，据说非常灵验。由于风景幽胜，潭面逐渐被商民侵占，每逢花晨月夕，还经常有游人游赏，箫鼓画船，岁时不绝<sup>3</sup>。有时，龙潭上还会举行龙舟水戏，某年端午节，董其昌就观看了龙舟竞渡，并作诗云<sup>4</sup>：

归客良恢侯，都人游冶场。繇来看竞渡，是处比浮湘。水曲鱼龙戏，风前缿彩香。只将反骚意，永日对壶觞。

董其昌也在此构建了一所坚致精巧的“书园楼”用以珍藏书画精品，时常与朋友、姬妾在此登高赏鉴。万历三十四年(1606)，董其昌从湖广提学副使任上辞职，回到家乡后居住在这里，他神怡务闲，创作了一本十二幅的册页<sup>5</sup>。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民抄董宦”事件中，书园楼被焚。据说当时愤怒的百姓将其匾额“抱珠阁”拆下抛入河中，并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后来又得以重建，名为“抱珠楼”<sup>6</sup>。抱珠楼外风景秀丽如画，董其昌将之与画中风景相媲。他收藏了董源的《溪山行旅图》，曾是吴门沈周、文徵明的藏品。一天，董

1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321—322。

2 《石渠宝笈续编》第18册《董其昌临王帖三种一卷》陈继儒跋，《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页1638，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前揭《松江府志》卷九《山川志》，页230。

4 (明)董其昌：《容台诗集》卷二《五日龙潭观水嬉》，页25，二十卷本《容台集》，上海图书馆藏。

5 (清)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卷三《董文敏书画册》，转引自前揭《董其昌系年》，页95。

6 前揭《民抄董宦事实》，页286。

其昌在西郊抱珠楼远眺城阴秀峰如簇、川源苍莽，他盛赞这风景是“一片江南画派”，便仿照《溪山行旅图》作了一幅山水画<sup>1</sup>。

董其昌还经常与朋友相约于城西“醉白池”觞咏唱和。入清之后，“醉白池”归顾大申所有，至今保存完好，特别是游廊之上嵌有原存明伦堂的“松江邦彦图”画像刻石，董其昌小像在焉。另外在闵行还有董其昌的一处别业“竹安斋”，植有元代柏树两株，一株到清朝中期已经枯萎，而另一株至嘉庆时还活着<sup>2</sup>。根据府志的记载，在上海叶谢镇，董其昌未中第时曾在水月庵读书<sup>3</sup>。在上海县城西南筑有“拄颊山房”，据说也是董氏读书之处。山房“厅事前之庭心极广，叠石成小山，山下有池，颇饶幽致”<sup>4</sup>。整体布局上看则“木石最为苍古，有池一泓，思翁洗笔于此。亭榭布置，洒落可喜”。墙上还嵌有石刻“溪山清赏”，是祝允明的笔迹<sup>5</sup>。至晚清民国时，山房所在之地仍然称作“董家宅”，后易名“倒川弄”。

## 四 结语

虽然董氏自宋代迁到江南，至明代便已发展为松江大族，但是董其昌这支却并不显赫，只是仅有瘠田二十亩的小户家庭。直到董其昌考中进士，跻身于社会上层，才逐渐通过当时社会允许的规则或购买、或兼并了大量土地，聚集了众多财富。董其昌属于迁入华亭城的新贵，他和儿子们逐步在城东南扩建第宅、修筑园林，并向城北、城西发展。董其昌在家中培养儿子们，同时也忙于收藏，乐此不疲。董氏诸子和他们第宅起伏兴衰的命运，既见证了晚明社会世俗的繁华，也显示了明清易代历史的悲凉。同时，本文将董其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明了化，有助于对董氏创作、交游及其相关收藏展开研究，对诸多作品的创作缘由和收藏始末都起到更好的理解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

(责任编辑：谭浩源)

---

〈1〉 (明)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六《画旨》，页13，二十卷本《容台集》，上海图书馆藏。

〈2〉 前揭《松江府志》卷七八《名迹志·第宅下》，页1751。

〈3〉 《松江府续志》卷三八《名迹志·寺观》，页3716，《中国方志丛书》，光绪九年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4〉 孙家振：《退醒庐笔记》页5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5〉 (清)王韬：《瀛寰杂志》，《中华文史丛书》第97册，页102，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